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 历史观问题研究

Dangdai Lishi Wenxue Shengchan Tizhi he
Lishiguan Wenti Yanjiu

吴秀明 / 主编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
历史观问题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吴秀明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04-9785-1

I. ①当…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历史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133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吴子林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中国拥有丰厚的历史遗产，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没有像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五千年的编年史和历史人物传记。这些都为我们的历史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学史上，《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东周列国志》、《桃花扇》、《清宫谱》等都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陈白尘等颇多作家，也有一定数量的作品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

然而，由于政治、文化和文体等方面的原因，自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剧因契合时代精神文化需求而异军突起，在历史文学领域中扮演着叱咤风云的时代主角；相反，历史小说则处于比较冷寂的境地，虽也有个别的长篇和一些精制的短章出现，但就整体而言，终未能形成气候，真正蔚为大观、风靡一时则是革命历史小说。而 20 世纪后半叶，主角似乎发生了易位，历史小说取代历史剧成了时代的新宠，并产生了一批广有影响的佳作；当然在此期间，它还涌动起一股日趋强大的历史题材影视热潮以及较后而至的新历史小说。这也说明，历史文学是“为时而著”的产物，它只有顺应时代的发展，尊重自身的创作规律，不再搞简单的影射比附，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吧，历史文学当之无愧地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文学史角度看，它可以称之为是继明代中叶首次高潮（以《三国演义》为标志）之后，在五百多年间中国历史文

学所仅见的又一次高潮。

本书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当代历史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将研究视点聚焦于这 60 年，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历史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同时也奠定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走向与特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也包括八九十年代多元不同的“杂色叙事”。二是就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而言，本时期的历史文学上承五四及以前的创作传统，横移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做法，它在创作时，事实上已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换的文化语境中展现民族记忆和精神文化底蕴、传达个人情怀与文化追求的独特手段，其生成、发展、传播和影响，早已超出文学范围而成为包蕴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而研究这些，不仅对历史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且对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及其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文化方面的经验教训，也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探讨历史文学，首先有必要对其概念内涵有一个界定，这是历史文学研究的前提，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历来众说纷纭、歧义迭出。何为历史文学？郁达夫在其《历史小说论》中给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文学（小说）而言。”^①这就是说，他所说的历史文学，即指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这类特殊的作品，它与历史真实往往具有异质同构的姻缘关系。郁氏此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不妨可视为是最经典的、也是迄今为止为多数学者认同了的一个概念。本书大体认同这个概念，只是主张不要将它简单化绝对化。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考虑近些年来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历史”或“历史事实”的认知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与之相应，历史文学不同于以往，从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到传播媒介、演绎手段等各个方面也在发生深刻的嬗变而显得更加丰富立体多元。如此这般，这就使原本比较复杂的历史文学，在概念内涵扩大的

①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7 页。

同时也显得更为复杂。

本书倾向于历史文学的文本叙述应遵循“基本事实、基本是非”要有所规范的原则，其所包含的内涵也不宜过于宽大无边，以尊重历史文学有别于一般文学的特殊审美属性。但为了避免歧义和扩充论述容量之需，在这里姑且沿用比较宽泛的概念来进行概括：即将只有“虚”的历史形态而无“实”的历史依据的纯虚构的作品如《红高粱》也视为历史文学引进视野，同时把它与革命历史文学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一起归属到“历史题材文学”这一整体概念上来，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谓的“历史题材文学”，从内部构成上看，实则包括了“传统形态历史文学”、“新历史文学（小说）”和“革命历史文学”三大板块或曰子系统，它涵盖小说、戏剧、影视、诗歌、散文乃至报告文学诸文体（本书由于种种原因，主要限于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影视；历史题材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很少涉及，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也许太宽泛了，但却可以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而同时又不至于对多数人认同的历史文学概念进行弃置，保持其合理合法的存在。在没有更好的命名之前，这样的划分也许是一个折中的办法，至少可聊备一说。

应该说，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当代历史文学是颇为关注的，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马振方的《在历史与虚构之间》，王爱松的《政治书写与历史叙事》，徐涛的《半领文学风骚——历史文学创作论》，李树声的《人的颖悟与梦的追寻》，吴秀明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真实的构造》、《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吴秀明和夏烈的《隔海的缪斯——高阳历史小说综论》，王一川的《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张进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吴玉杰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剧的建构》等。研究生中以此为选题作为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为数不少，仅浙江大学近几年博士论文就有赵天才的《革命的时代镜像——中国当代小说的革命叙事研究》（2004年）、郭剑敏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1949—1966）的意义生成》（2005年）、王姝的《多元裂变下

的“史诗性”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研究》(2006年)、蒋青林的《历史话语世界的精魂——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研究》(2006年)、杨鼎的《“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影视剧研究》(2007年)、詹玲的《被规训的历史想像——评五卷本〈李自成〉》(2008年)、黄健的《穿越传统的历史想象——新历史小说精神的文化阐释》(2008年)等。有关的历史文学研讨会也开过不少,其中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有1996年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召开的“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1995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2003年浙江大学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历史文学的世纪之旅》,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社会科学管理层面也对历史文学给予高度重视,从90年代开始,就有多项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如《历史文学研究》(1992年)、《新时期以来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研究》(1996年)、《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和历史观问题的综合研究》(2004年)等;教育部在2005年还特为此以《历史题材创作和改编中的重大问题研究》为题,作为本年度仅有的两个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文学类课题之一。本书就是上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和历史观问题的综合研究》最终成果的汇总。

尽管这些年来在历史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一是研究者对当代历史文学的文本即兴评论居多,学理性综合考察缺乏,尤其是对当前引起人们困惑乃至不满的历史文学创作现象和问题,缺乏深层学理的回应;二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局部现象研究居多,但随着历史文学在近期的迅速发展和深层次问题的逐渐暴露,以前的研究者限于思维视野或知识结构,没有立足整体高屋建瓴地揭示其内在历史观和发展规律;三是研究方法上以形而上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形而下的具体文本研究方法居多,尚未提炼出一种行之有效并能兼顾影视等新型历史文学演绎手段的综合性的研究范式,也缺少一种联系文本实践的文化学特别是文化体制的研究。本书试图对自己和别人已有研究成果作进一步推进和拓展。其研究的意义,是试图

探讨和解决历史文学本身复杂状态所造成的一系列认识和评价上的困惑。具体说来,目的有二:一是鉴于当代历史文学形态的丰富性,比如各种历史观、价值观的复杂纠结,各种叙事话语的众声喧哗,多种生产和评价体制的同时呈现,等等,这都需要从理论上认真进行清理;二是鉴于当前历史文学本身所包含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它对国家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知,对民族未来文化走向的选择,乃至对人类自身理性意义的审判尺度的探求,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需要寻找衡量历史文学应有的价值尺度,加以研究和总结。

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是:拟从当代文化建构的理性高度入手,以中外历史文学尤其是20世纪中外历史文学丰富复杂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为背景和参照,将审美研究与思想文化考察、文本剖析与文本形成路径追溯、个案研究与综合分析、史实透析与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强化问题意识、前沿意识、批判意识和整合意识;力求使研究兼具学理深度、学术厚度,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全书共九章,除第一至二章对历史文学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总体构架与现实谱系进行归纳和梳理,为全书的论述作好必要的铺垫,第九章对“红色经典”这个敏感而棘手的历史文学热点难点问题专题探讨,以期将整体思考和评价作适当的延伸外;其余六章,主体内容可分如下三个部分:

(一)第三至四章为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研究。体制问题是制约文学生产的重要原因,针对目前学界对历史文学生产体制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的现状,这两章以《海瑞罢官》、《刘志丹》、《红岩》、《青春之歌》、《沙家浜》等作品为例,着重揭示历史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政治文化体制、市场文化体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毛泽东历史文学观与主流评价体系的确立,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及由此形成的发表、出版、批评、评奖制度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倡导与控制,当代文学新秩序与“革命历史”叙事的规范与修改,作家对政治文化体制、市场文化体制的顺应、超越和曲折形态的批判或批评,等等。研究力求从历史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市场与政治体制的多重作用,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与人们消费历史的多重欲望,人的解放的现代性进程和民

族文化的寻根和认同,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困惑与精神探求等多方面,对当代历史文学体制成因进行深入考察和揭示。

(二)第五至第六章为历史文学的历史观问题研究。这两章主要讨论当代整个社会历史观的复杂内涵与哲学根基,以及创作者和批评研究工作者对历史观的选择及评价;从这一连接沟通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创作实践、影响制约历史文学生存发展的根本核心问题出发,探求和总结历史文学成败得失的深层原因。研究首先从历史观的价值位置及其对体制与叙事的制约入手,考察当代历史文学历史观的沿革和多元复杂的存在方式,包括主流的、非主流的(如新历史小说)历史观,以及90年代题材位移后历史观的调整,“元典”历史观的寻找及其当下的生存境遇,等等。然后以国家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塑为价值目标,进而探讨其历史观的具体表现形态,内容包括新保守主义与新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民族与民间的不同路径,现代民主观念、工商思想和女性主义的多种实践。在注意历史观丰富复杂的前提下,一方面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和有益于民族精神健康生长的创作原则,主张符合时代精神的多元价值的兼容和互补;另一方面又倡导探寻与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当下的先进文化相适应的大境界、高品位的历史文学历史观、价值观。

(三)第七至第八章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实践研究。这两章紧契虚实关系(真实观)、审美转换展开,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锁定在叙事形态的层面。首先在对当代历史文学真实历时演进与现代嬗变描述把握的基础上,归纳三种真实的书写形态:依真实形态的历史文学,拟真实形态的历史文学,借真实形态的历史文学,对它们进行细解和分别作出评价;并联系实践,就不同形态或范式的历史真实的不同呈现,现代意识之对历史真实的特殊功能效应,以及在“主流”之外的边缘真实进行论析,指出正是它们共同合力打造,才成就了当代日趋丰富的历史文学真实。然后以艺术审美为学理基点,探讨历史文学史诗形式的构建与消解,审美与审丑的新走向,叙事的个人化与日常化,等等,以期将历史文学研究由体制生产和历史观问题审思内化和转换为审美构建,从而实现有序化和体系性,获得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全面反映和概括。

总之，本书一方面联系历史文学的生产，另一方面紧契历史文学的文本，中间又以历史观问题为统契；既注重历史文学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总体构架与现实谱系，又围绕历史文学“现代性”这一核心的价值观念和创作基点问题。这样，有助于摆脱就文学谈文学的局限性，也可避免就文化谈文化的空洞性，从而获取一种恢弘的学术视野，进行切实的审美批评。

（吴秀明执笔）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1)
第一节 与传统及现代新传统的关联	(1)
第二节 延安经验和新中国成立初历史剧问题讨论	(6)
第三节 《武训传》事件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16)
第四节 新时期以来的转型和发展	(23)
第五节 成就和存在问题原因探析	(26)
第二章 总体构架与现实谱系	(33)
第一节 三元文化的解读	(33)
第二节 主流历史文学的历史言说	(41)
第三节 精英历史文学的精神坚守	(47)
第四节 民间历史文学对历史的态度	(53)
第三章 体制写作的历史形态	(60)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60)
第二节 毛泽东历史文学观与主流评价体系的确立	(65)
第三节 政治领袖指令下的奉命写作：《海瑞罢官》的生成	(70)
第四节 政治是非评定下的悲喜命运：《刘志丹》的两度被禁	(80)
第五节 政治权力秩序下的诡谲多变：《保卫延安》的坎坷历程	(98)

第四章 体制写作中的革命叙事	(113)
第一节 文学新秩序与革命历史叙事的规范	(113)
第二节 《红岩》:文学体制不断规训的产物	(122)
第三节 《青春之歌》:集体声音参与修改的结果	(135)
第四节 《沙家浜》:体制转换导致不同版本之间的殊异	(150)
第五章 历史观的存在方式	(159)
第一节 历史观的价值位置及其对体制与叙事的制约	(159)
第二节 政治文化镜像与主流历史观的嬗变	(167)
第三节 历史文学题材位移与作家历史观的调整	(173)
第四节 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及其解构性的特征	(179)
第五节 元典寻找及其当下的生存境遇	(186)
附: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历史文学创作	(197)
第六章 历史观的表现形态	(224)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新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	(224)
第二节 民族与民间的不同路径	(234)
第三节 现代民主观念的融入	(246)
第四节 现代工商思想的凸显	(254)
第五节 女性主义的多种实践	(262)
第七章 历史真实的书写	(270)
第一节 历史真实的历时演进与现代嬗变	(270)
第二节 历史真实的不同范式	(276)
第三节 现代意识观照下的真实及其表现	(283)
第八章 艺术审美的构建	(289)
第一节 史诗形式的构建与消解	(289)

第二节 审美与审丑的新走向	(298)
第三节 叙事的个人化与日常化	(308)
第九章 关于“红色经典”的当下重构问题	(315)
第一节 “红色经典”重读:背景与意义指向	(316)
第二节 “红色经典”重写:世俗化及其原因	(326)
第三节 “红色经典”重构的反思	(340)
后记	(343)

第一章 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如同当代文学的所有门类一样，当代历史文学与此前的历史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历史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发展，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古今沿革特别是 20 世纪之发展作一简单回顾。

第一节 与传统及现代新传统的关联

历史文学作为一个独特形态的话语，它最早滥觞于历史传记简称史传或曰纪传。史传是属于史学的，它较之“编年体”的历史自然更具有文学味乃至不乏美学价值；但无论如何，它的职能和机制毕竟主要是为了述史而作，崇尚朴实雅洁。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然而，《史记》只是文学性较强的历史，不能归属于历史文学门下；尽管它的有些篇什，特别是《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列传》等写得笔墨酣畅，神采飞动。历史文学是从史传发展而来的，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历史”本身。反过来的顺演轨迹即是：

历史——>史传——>历史文学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4 页。

准此，它的源头关系可作如下辨析：从“历史”与“史传”、“历史文学”关系看，前者是后两者共同的“源”；从“史传”与“历史文学”关系看，前者只是后者的“流”。有这样的“源”，又有这样的“流”，这就决定了历史文学从它降生的那天起即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传对历史真实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崇尚的是“正统”的历史文学观。何谓“正统”（或曰“正史”）？吴泽的一段表述较有代表性：“纪传体”以帝王的传记为纲领，被称为“正史”，北洋军阀时期把近人柯邵忞写的《新元史》列入“正史”，人们统称之为二十五史^①。由“官方”钦定的历史版本，用当下的词来表述，就是“历史教科书”，它们无疑具有某种“正统性”、“合法性”，从而对人们产生压倒性的精神统摄力，成为历史叙述中的强势话语。因此，与“正统”相符、一致的历史叙述被认为是走正道，也能被广泛接受。评价《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就显得“名正言顺”，因为刘备是汉代皇姓之后。明朝吴翼登在《叙三国志传》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信乎统之必以正也。虽谓三国，止一国；三国之志，止一国之志可。”^②在某一朝代之内，无论皇室是好是坏，是强是弱，只要它还没有在名义上灭亡，那么能够代表皇室的力量或是用皇室名号发表的言说，都是“正统”的，具有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匹敌的影响力。这种“正史观”强调“个人”、“英雄”的作用，突出“正统历史”中的人物在历史构建与延续中的重要作用。《三国演义》中很明显将刘备建立与维护蜀国的作用强调到极致，尤其是他的道德感化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的“正统”历史文学观在当中起着潜在支配作用。

正统观的形成与逐渐稳固，主要来自于历代统治者有意识的努力。只有建立“正统历史”，统治者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证明，他们治理天下的“仁政”才能获得某种内在的权威性与统摄力。那些不符合“正统”需要的内容，或多或少地会遭到禁写，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明清中的“文字狱”案件就可

^① 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蔡东藩《前汉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② 吴翼登：《叙三国志传》，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2页。

一目了然。当然这是很粗疏的一种描述，不能太绝对化。即使在“正统观”实施过程中，也时有不和谐的“杂音”出现，而且愈后愈响亮，充满了“正统”与“僭越”的张力。随着历史的进展，尤其是近代以来，受外来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历史文学中反君主、反正统的言论逐渐出现和发展。清人黄小配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大胆地表述了自己“惊世骇俗”的想法：“余尝谓中国无史……是纲也，鉴也，目也，只一朝君主之家谱耳，史云乎哉！”^①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在清末其实已经形成了市场，在一批思想先驱者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共识。与黄小配的言论极为相似的，还有梁启超的历史著作中所阐述的主张。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就从“经世致用”的要求出发，提出编纂资产阶级“国史”和“民史”，反对封建“君史”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各种体裁的史书都“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不能继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不是良史，应当废掉。燕南尚生则进一步地阐明了这种历史书写形成的原因，指出权力在历史叙述中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名是信史。其实直成了独夫民贼的喜怒录。”^②权力歪曲了历史，真正的历史自然无法寻找了。以往所标榜的“正统”、“正史”都成了精致的遮羞布与美丽的谎言，这等于颠覆了整个古代历史观的立论根本。至此，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颠覆了古代正史观，它推动着历史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历史文学观，鲁迅为代表的以“立人”为核心的历史文学观，李大钊为代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文学观等，顺应时代潮流迅速兴起^③。它们都曾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历史文学观，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和阶级斗争严酷的时代，一度更是得到迅猛的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中国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则是从20世纪30年代始，现代历史文学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描写历史人事的

① 黄小配：《洪秀全演义·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②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命名释义》，《〈水浒〉评论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1页。

③ [中]王富仁、[韩]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一），《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3期。

逐渐增多，农民起义题材一时颇为可观。孟超的《陈涉吴广》、茅盾的《大泽乡》、郑振铎的《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等大力歌颂农民起义领袖与在历史进程中起到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作品中判断历史人物的标准就是阶级斗争史观。《黄公俊之最后》视太平天国起义为“民族解放战争”，毫无保留地赞美黄公俊为太平天国奔走游说；而与黄公俊有着旧谊的曾氏兄弟因帮助朝廷镇压起义，自然就成为“汉人自立”的民族斗争中的叛贼、“不肖子孙”。在这批作品中，阶级斗争的两极思维与评判标准显露无遗。

与之相应，运用阶级史观对历史文学进行理论批评也形成气候。与五四时期批评无所顾忌地反叛、颠覆的风格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历史题材创作批评所关注的中心明显地从个体向阶级转换。郭沫若回顾他的历史文学创作时曾说：“我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我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①“人民本位”的思想，不仅指导着他在历史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艺术处理，也指导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郑振铎虽不是左翼作家，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其爱国思想与革命热情更加炽热。他不断修正过去文学“为人生”、表现“血与泪”的思想，认识到“‘血与泪的文学’只是幻想中争斗的成绩”，要求作家不要“沉迷于个人的小小的悲愉之中”，明确提出“伟大的作家们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总是为最广大的群众而写的”^②。郑振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批评观，是与他的社会经历及自觉的历史小说创作实践相一致的。从那一时期具体的历史情况出发，我们认为作家与批评家主动融入时代大潮是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当历史文学创作契合时代理论与现实发展需要时，它能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趋同。阶级和阶级斗争主题在现代文学后期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绝非偶然。

在这里还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主题在现代文学后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与批评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历史文学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方向与

① 郭沫若：《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郑振铎：《我们所需要的文学》，《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页。